

# 关于社会资本和文化消费的若干问题

## ——以上海社区为中心的观察与思考

周 枣,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 城市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程度和文化消费规模受多种因素影响, 由于上海城市综合经济基础好、社会文化发达程度高、新社会阶层规模大、居民参与热情高等原因, 其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在中国位居前茅, 已经成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受投资回报率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不同行业领域和城市区域的参与程度仍有较大差异, 具体表现为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健身馆、舞蹈厅以及文化娱乐场所参与水平高, 而投资大见效慢的社会性医疗机构等领域参与水平低, 在区域上则是城市中心社区参与程度高而郊区参与程度低。通过对上海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等的特点和方式进行分析, 发现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体现出明显的“互惠”性特点, 在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表现突出, 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促进了社区文化消费总体规模的增长。上海社区建设的优秀经验和管理方式说明充分运用社会资本能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创新社区管理方式, 激发社区文化活力, 能更好地体现出城市的人文关怀和精神风貌, 同时也能为中国其它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建设提供有益经验, 使社会资本和文化消费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文化消费;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6-0089-06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 他于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 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sup>[1]</sup> 詹姆斯·克尔曼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领域, 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今, 在学界研究中社会资本已成热点, 广泛见于城市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区治理、社会阶层、就业与移民等研究领域, 虽然国内关于社会资本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 但社会资本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同, 社会资本对于城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 社会资本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社区建设以及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根据拥有者可以分为个人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三类, 即个人、组织、企业等都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参与城市建设。<sup>[2]</sup>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 从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建设、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个人、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 一、城市发展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改革开放的主导机制, 这是中国大城市迅速发展的主要背景。从1978年至

**[收稿日期]** 2019-09-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江南文化研究”系列课题《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课题批准号: 2018XAC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枣(1992-), 女, 湖北仙桃人, 博士研究生,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

刘士林(1965-), 男, 河北曲阳人,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

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特别是以2005年为界标,这一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城市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逐渐淡出,大城市发展愈加势不可挡。在中国最新的城市分类中,“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标准已从原来的100万人提高到500万以上,而最新提出的“超大城市”概念,则是指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有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成都7个超大城市,如果按照实际生活在城市的人口统计,超大城市的数量会更多。人口和资源在大城市中的集聚,为城市各板块、各层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关于城市发展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我们认为可从三方面来了解:一是城市经济。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母亲,城市经济的基础实力和发展质量是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社区建设落后于东部地区,根源仍在于城市经济实力差距过大。二是城市建设。社区社会资本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一般来说新城、新建社区由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高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群较为集中,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发展,相反老城区城市空间狭小,基础设施落后,社会资本建设落地更为困难。三是人的因素。城市“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也是影响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创业人员、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sup>[3]</sup>他们掌握着大量资源,也具有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意识和服务意识,对城市社会资本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sup>[4]</sup>据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新阶层在上海已超过440万人,其中,个体工商户约36万人、私营企业主约160万人、受聘于外资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约60万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和技术人员约30万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约75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80万人,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社会资本发展的主力军之一。<sup>[5]</sup>

## 二、上海社会资本发展现状

关于上海社会资本水平的高和低,一是由于数据缺乏,没有相关的准确统计;二是没有权威的评价标准,说不清“多少算高,多少算低”,很难做出准

确的描述和评价。但综合已有的信息可知上海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在全国居于前茅,但在不同行业领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上海社区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上海经济综合实力位于全国前列,为社会资本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其次,社会总体发达程度较高,具有发展社会资本的良好外部条件;再次,上海新社会阶层人口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热情高,使上海社区社会资本建设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最后,上海市各级政府不断创新推动社区建设的管理方式,激发了社区建设的活力,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的文化活动中心,就委托给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运营,政府变成“监督者”,不再直接“组织”和“管理”。

社会资本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本进入社区服务中心并非完全是公益性质,还需要考虑到经济收益和投资回报率,因此在对社区不同领域进行投资时会综合考虑投资回报效率、投入成本高低、区域竞争环境以及社区居民需求等方面,投资少见效快的健身房、舞蹈厅、文化娱乐活动或是有政府资本资助的社区学校,社会资本往往介入较多,而投资比较大的社会性医疗机构则介入较少。

社会资本在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城市中心区与郊区差距明显。“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例,在徐汇区、静安区等中心城区,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而郊区平均每3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个别的如奉贤区奉城镇,100平方公里只有1个。”不仅数量分布不均,服务水平差别也比较大,如闸北区的临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服务项目40余个,年服务人次超过了70万。而远郊地区的服务项目一般不足10个,服务人次不到市区的10%,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社区文化中心被挤占、挪用等问题。

## 三、基于“互惠”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波茨和塞森布雷纳总结了在古典学上社会资本认定的四个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齐美尔的“互惠交易”,“它是指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sup>[6]</sup>,它强调“信任”对于互惠交易的重要性。社区作为城市的小型组织,居民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了社区内部成员之间认可的社区文化以及社区归属感,居民在享受社区服务时往往也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sup>[7]</sup>因此,对于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帮助社区困难人群,居民的热情普遍较高,这对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开展“互惠”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加之上海城市居民经济基础较好,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因而上海城市社区的互惠水平在很多方面不

输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此外,由于受本土海派文化精明细致特点的影响,上海社会的“互惠性”也体现出自身的独特之处。

#### (一)上海“互惠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类型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社会资本和社区居民参与”的。如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试点旧衣回收,自2010年起,先在闸北区临汾街道试点设置旧衣回收箱,并委托专业公司统一收集。到目前为止,全市的废旧衣物回收箱总数已超过2000个。此外,每年春节或一些特殊节日,各级政府按惯例也会“访贫问苦”,开展各种“送温暖”活动,既包括慰问金、购物券,也包括衣服、粮食等。

二是“在政府支持下、由相关社会组织主导”的。如2003年12月成立的上海市民帮困互助基金会,截至2018年8月该基金累计开展综合帮扶57万人次,其中,“个案帮扶”超过18万人次,累计用于综合帮扶的各项资金达9.3亿多元,综合帮扶工作已经成为上海市的慈善项目品牌。

三是由新闻媒体报道引发的。其中,有的是因为自然灾害,如2012年夏天台风“海葵”袭击上海,很多私家车主自发组成“爱心车队”接送滞留人员。有的则是因为突发事件、经济困窘以及疾病等导致的生活不幸,在媒体报导和动员之后,市民在物质与资金方面都会给予积极的“帮扶”。此外,上海交通广播电台的“大家帮”、上海电视台的相关帮助市民排忧解难节目,也都很有影响并广受欢迎。

四是民间自发的。由于社区活动的丰富,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居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邻里关系,在各社区文化中心对“互帮互助”行为进行大力宣传和倡导下,民间自发的互惠活动非常之多,“有余者”往往无条件支持“不足者”。例如,2015年徐汇区华泾镇印象旭辉社区党员自发组织募捐设立专门款项帮助社区经济困难家庭、突发意外事故家庭。目前,类似的活动在上海各社区、街道已经非常普遍。

#### (二)上海“互惠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首先,传统人际关系仍是上海“互惠性”的基础。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虽然海派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基因以及上海自由开放的城市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人际关系,使上海成为中国“最洋气”和最时髦的城市,但上海毕竟是“中国的上海”,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英雄情怀依然是上海文化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上海的“互惠性”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此外,尽管由于分割居住和生活的紧张忙碌,大都市成年人的邻里联系日益减少,但通过他们的父母和孩子

等,同一或相邻社区的居民也会自发形成各种“互惠”关系,经常性地交换来自各自家乡的土特产和其他礼物。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不仅没有彻底解体,有时在上海的表现还相当强烈。<sup>[8]</sup>

其次,一些新的社会和社交关系产生了“新功利主义互惠性”。上海既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时髦的城市,其追新求异的城市性格使新的组织形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总是先在上海“落地”然后再传播到全国。与传统社会那种“非功利”的“互惠”行为不同,当今上海社区的“互惠性”包含了比较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各种“新社会基层”在组织联谊会时都会进行一定的公益馈赠,但服务社会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他们是希望通过公益活动的方式来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为后续的经济合作做铺垫。这其中包括各种表面上基于爱好和趣味出现的时尚生活方式,如车联网、驴友团及一些健身娱乐团体等,其中联系密切程度、物质馈赠比重,也都基于比较精明的“算计”和“判断”。

再次,上海的“互惠性”在文化、教育和艺术等领域表现较突出。由于上海居民经济基础较好,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也相对较高,因而上海的“互惠性”并非只停留在物质等基本需求层面,而涉及到了艺术、教育、文化等高层次的需求,真实再现了“既有钱,也有闲”的上海城市特点。如曹杨社区的收藏爱好者曾以“重温历史,见证发展”为主题举办民间收藏博览会,不仅展示票证、书籍、根雕、烟标等藏品,还向观众讲授每件藏品的故事。在上海,类似的读书和交流活动很多,节奏也非常频繁。如上海师大退休教职工自发组织“银龄互助义工”,通过结对、慰问、交流等方式“以老助老”,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为农民工子弟提供免费补习等。

### 四、社会资本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在关于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上海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法规,集中在公共交通、公共绿地、公共文化服务、社区行政中心、社区医院、社区养老等领域。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和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居民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之中,目前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以社区养老为例,和一般城市的“一小时服务圈”“半小时服务圈”不同,上海的目标锁定在“15分钟”内,实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实现了以“一站式综合服务”“一体化资源统筹”“一网覆盖的信息管理”和“一门式的受理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截至2018年底,全市已经建成155家长者照护之家和180家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未来将实现全市街镇与基本管理单元的全覆盖,这既是上海城市雄厚经济实力的显示,也是城市社会服务理念的创新。

在具体建设措施上,最值得关注的是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式。目前,上海社区公共服务的许多领域正在逐步对社会资本开放,以上海南站绿轴公园为例,徐汇区一改公共绿地和城市公园一般由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模式,积极引进社会资本,由上海徐汇万科中心对该绿地“代建代管”,将其作为公共服务无偿对市民开放,政府则转到幕后,主要负责出台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政策。另外还有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把社区生活服务联动中心交给社会力量创办的“96890”社区服务机构,通过在线服务、呼叫中心、远程定位监控和社区车辆巡视,组成全方位、个性化的社区服务网络,为在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此外,政府也是社会资金、资源整合利用的牵头人。2011 年长宁区通过财政投入、社会募集等多种渠道,成立了总额达 1.5 亿元的“长宁文化发展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奖励、资助符合城区文化特色、为城区文化做贡献的公益文化项目和文化名人。

志愿者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形式。上海在 1997 年就成立了市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涉及到助老、助残、助医、助学、助困、邻里互助、敬老爱幼、护绿宝洁、交通管理、治安防范、法律咨询、就业指导、科学普及、医疗保健等方面。2008 年成立的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引入各类组织合作或直接提供服务等方式,托管了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杨浦延吉社区睦邻中心、上钢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中心、杨浦延吉社区社会服务中心、闵行康城生活服务中心、外滩街道阳光之家、五角场志愿者中心等机构,开展扶老、助残、环保、青少年教育等活动 1600 多次,为 200 多万人提供了相关服务。而各种具体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如现在市民广场景观灯的开关时间,就是根据市民意见和反映调整确定的,好第坊社区志愿者杨洁和居委会一起办读书会、上海交通大学附中老师主办的“亲子骑行”等,都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典型。

## 五、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精神内涵所在,它是城市居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中,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合作、了解等形成的具有社区独特性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群体意识等文化现象的总和。<sup>[9]</sup>对于社区建设而言,它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对城

市发展而言,有助于树立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同时,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因群体结构复杂而造成文化活动针对性不强的缺点。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广泛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通过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不断满足各个群体的需求,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 (一) 上海社区文化活动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上海社区文化建设成果斐然,除了政府政策引导和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之外,还在于上海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较高,这与上海文化基础设施条件优越、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强烈、老龄人口较多以及文化活动水平较高等四方面因素有关。

上海无论是在社会文化环境等软实力方面,还是在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硬实力方面,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地区,这为上海市民文化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共建有 230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5129 个村(居)综合文化活动室,服务功能得到明显提升,初步形成了公共文化 15 分钟服务圈。此外,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也是亮点,目前,“文化嘉定云”“文趣闵行”和“闸北智文化服务平台”已建成上线,可提供公共文化活动预约、场馆预定、网上浏览等,有效整合了各条线上的公共文化资源。

正如前文所言,上海居民收入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便后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海从 2013 年便开始举办上海市民文化节,时间从每年 3 月延续至年底,分春、夏、秋、冬四个阶段,以全市 208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主要活动场地,同时在重点文化广场、公共绿地和部分商业中心设立了 70 个室外活动场地,举办活动近 4.5 万次,有百个社区和万支团队参与。像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市民艺术节,如果没有市民的热情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

上海还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截至 2017 年底,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483.6 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 33.2%。近三年来,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速分别为 5.6%、5%、5.3%,上海已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些老年人基本上“赋闲在家”,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许多社区都开展了大量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服务活动,老年人已经成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重点帮扶对象和文化消费群体。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年龄大造成日常自理困难和生活单调乏味是最主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截至2017年底,上海市已经建设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00个,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560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34家,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707个,除了对老人进行全方位的日常照顾之外,还提供丰富的娱乐活动消遣时光。此外,各色各样针对老年人设置的课程、文化活动层出不穷,促进了老年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由于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区文化活动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娱乐性,能够更真切地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社区居民组成结构复杂,年龄结构多样,文化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爱好等皆存在差异,社区文化活动应该充分考虑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让文化服务更加多样化。例如静安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早期建立社区学校主要是针对老年群体,设置的课程主要是老年居民喜欢的笛子、戏剧、评弹、旗袍秀等等,后来考虑到社区还有大量的白领阶层和小孩,便增加了专门针对该群体的课程,并充分结合白领阶层和小孩的休闲时间安排课程。另外,在课程的设计上设置入门班、特色班、高级班等,增加课程选择的梯度性,充分照顾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

## (二)上海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

一是政府的文化组织和管理。目前,政府管理社区的方式大多是“大包大揽”,结果便是政府提供的往往不是居民所需要的,造成了公共文化资源浪费,也受到较多的批评。但不能因为这样便忽略了政府的作用,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无论是调动居民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还是大型活动的组织、文化竞赛的评选等都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和引导,如静安区建设的社会化教育网络和市民学习平台,虹口区曲阳街道建设的学习型社区,松江区引导居民自发组织业余文艺队伍,吴泾镇帮助老年居民建立的“工笔画团队”等,说明在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关键在于如何创新管理方式来避免政府过度介入带来的问题。<sup>[10]</sup>

二是新闻媒体的传播。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新闻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运用现代传播方式进行宣传时也要认真审视新闻媒体这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极大提高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成为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助推力。相反,则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一些虚假新闻,以及一些带有犯罪性质的诈骗,便是利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需要。

三是居民中“有声望的人”的示范。社区中“有声望”的人往往能够赢得居民的尊敬,也是社区居

民学习的对象,他们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可以调动其它居民的参与热情,同样他们的离开或过世,也会影响相关社区居民文化参与的活跃度。

除了以上因素,关键是要在各相关方之间形成合力,这将是推动社会文化建设上水平的重要支撑平台。

## (三)上海市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

为了提高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水平,2015年上海市文广局出台《关于推进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工作方案》,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建设。目前在上海一些大型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基本上都有企业或社会资本的参与,由于上海市整体文化水平高的原因,一些活动也不乏有趣的创意。

企业与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或社会资本直接参与社会活动的建设,与社区相关管理机构共同搭建各式各样的社区服务平台。比如浦东新区金桥镇社区文化中心采用项目委托的方式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将社区内部的健身房、舞蹈房、游泳馆等休闲服务设施交给公司管理经营,采用“政府购买、公益服务、市场运营”的方式进行管理,进一步促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专业化水平。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了完善社区管理制度,丰富社区文化活动,与上海星之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昆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企业和文化机构签订管理服务协议和文化教育共建协议,同时还与上海市大同中学、市八中学、三山会馆等建立了资源共享协议,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推进社区文化活动的专业化、多样化。

另一种则是在社区文化中心组织的活动中提供临时性的公益服务。如国庆期间的仙霞美食文化节,由仙霞路美食特色街餐饮业出资出力,为社区老年人做了20桌免费长寿餐,相关企业家会亲自给老人们端上一碗碗长寿面,祝愿他们健康长寿。还有沪东街道的“点亮微心愿”,微心愿是指价值不超过1000元的心愿,通过《人文沪东》社区报、沪东“微心愿”公众微信号等采集和发布。在首季“微心愿”活动中,38个微心愿几天内被认领一空,其中包括为社区内一对老夫妻更换厨房木板,为社区残疾人量身定制轮椅车,为失独家庭卧床的病人送去尿不湿等。这些虽然是琐事小事,但却直接涉及七百万老人的切身利益,很好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

总之,社会资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

它产生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持续的互动。社区是城市的缩影,相比之下,更容易形成统一的社区文化和规范,由于频繁的接触,信任在社区成员之间更容易建立,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sup>[11]</sup>目前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介入较多的领域,它能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带动城市文化消费规模,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John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1985.
- [2] 陈柳钦.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J]. 东方论坛,2007(03):84—91,121.
- [3]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286.
- [4] 鞠桂萍. 试析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新内涵及哲学意义[J]. 人民论坛,2014(08):31—33.
- [5] 上海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现状调查与分析[J]. 中国统一战线,2014(01):49—50.
- [6] 杨冬雪. 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3):9.
- [7] 刘笋. 社会资本:和谐社会的粘合剂[D]. 东华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 [8] 费孝通. 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 江淮学刊,2002(03):15—18,206.
- [9] 马海燕.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04):103—106.
- [10] 郑杭生,黄家亮.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 甘肃社会科学,2012(06):1—8.
- [11] 肖星.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D]. 上海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闫卫平)

##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into Shanghai community

ZHOU Zao, LIU Shi-li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scale of urban communitie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Due to the good foundation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level of social culture development, large population of new social strata and the high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for community building, Shanghai has achieve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returns on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reas has much difference. The industries which need less investment and quick effect (such as gyms, dancing clubs and other cultural entertainment places) have high level of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industries which need large investment and slow effect (such as social medical institutions) have low level. Mean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in downtown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suburb.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find that Shanghai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 of "reciprocit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culture, art and education. Social capital'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lso presents a diversified, professional and socialized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promotes the overall growth of community cultural consumption. Shanghai's excellent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reflects that using social capita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pressure, innovate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 and stimulate the community's cultural vit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tter reflect the city's humanistic care and spiritual outlook and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for other Chinese c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hich promote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onsumption; urbanization